曾国藩智慧小集



编者三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为官篇 1

为官智慧 1

为官警语 21

为官智慧 24

为官警语 34

为官智慧 38

为官警语 44

为官智慧 46

为官警语 55

为官智慧 56

为官警语 79

驭人篇 81

驭人智慧 81

驭人警语 91

驭人智慧 92

驭人警语 94

驭人智慧 97

驭人警语 100

驭人智慧 101

驭人警语 108

治军篇 109

治军智慧 110

治军警语 115

治军智慧 117

治军警语 122

治军智慧 129

治军警语 138

治军智慧 140
治军警语 151
济世篇 157
济世智慧 158
济世警语 170
济世智慧 172
济世警语 178
济世智慧 181
济世警语 187
济世智慧 189
济世警语 194

为官篇

曾国藩为官一生，始终以为：心无天下，不可做官；言行不慎，不可做官；胸无防范，同样不可做官。他的仕途既有酸甜苦辣的人生经验，又有权谋的居官智慧。

为官之人，须有好的品性和素养。曾国藩能终生明辨险夷，以超人一等的胆识引得众人刮目相望，又能以居高思危、隐匿锋芒获取朝廷的信任，凭的是“礼治”与“仁政”。曾国藩能忍他人所不能忍，心平清静，终生忍辱负重而不沉郁，能谈出一堆堆别人难以说清的为官之道的妙法，凭的是“恕忍”与“血诚”。

曾国藩为国而起，为国而终，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耶?非耶?他的做官之智，为后人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借鉴。

素怀平治天下之志的曾国藩是抱着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步入仕途的，他的为官之道是：以德求官，以德居官。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当严，待庸众之人宜宽严互存。为官者惟公则生明，惟廉则生威。

为官智慧

1 匡才救世，步入仕途

“匡时救世”，此乃曾国藩步入仕途的人生目的。

曾国藩自青年时代起，其功名心就很强盛。他的同乡好友刘蓉曾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自己

也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欲刻苦而自振拔”。1838 年，曾国藩殿试成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常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羞愧。此后他更加努力，跻身于翰林行列，苦读十载，终于登上了封建科举仕途的最高阶梯。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同意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然君子立志，志在何方?曾国藩以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世界。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会更大，需要各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自 1838 年成进士，1840 年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他为期 12 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未能成为一个实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

山。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他在 1852 年为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具呈亮基代奏。缮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守，人心惶惶，恳请曾氏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命出山而治事。于是，曾国藩毁弃前疏，于 1853 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为什么曾国藩最终还是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呢?这在曾氏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我虽在守丧之时，但为国家利益、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从此以后，曾国藩虽历尽千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敢懈怠，为清廷尽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关的时刻，也在所不辞。如 1854 年兵败靖港，忧愤投水欲自尽，被章寿麟等救起，随后反复掂量，终于鼓足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作战。每次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观。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

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拚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因此，这种救世人生观，不仅在咸丰、同治期间对封建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 19 世纪末年乃至 20 世纪初年，亦在激进民主主义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迹。近代湘籍爱国志士就有如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自立军起义期间的唐才常，从小就立志“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长在湖南乡下、曾在湘乡等地求过学的青年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吸收、消化过程中，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对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2 心忧天下，担当国任

曾国藩的仕途之路充满艰辛。其时，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清王朝，其腐朽的本质已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却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逐渐觉醒，开始注意世界发展的大势，重新考虑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以新的斗争形式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鸦片战争后的 10 年间，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以两广、湖南为先声，江淮、黄河两岸的会党、白莲教等，均在积极活动，酝酿起事。形势发展最快的是广西。

广西土瘠民贫，各民族杂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是一个极易发生起义和变乱的地方。从清朝初年开始，广西便是反清团体“天地会”的重要活动地区。鸦片战争期间，“广东招募乡勇，防守海滨。军务平，遣散之勇，

半系无业游民，流入广西，剥掠为生。”大批被裁撤的广东勇丁无以聊生，不断涌入广西，成为当时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自英敌滋事以来，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多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广西本省也遣散了大批壮勇，广为聚集，乘机暴动。当时，这些被遣散的兵勇，多半成为“天地会”的会员，因此自道光末年以来，广西的“天地会”分布日广，山堂林立。加之广西吏治黑暗，兵勇淫掠，地主剥削，天灾流行，逼得广大农民无以求生，便纷纷集结在各山堂之下，到处暴动，以求得幸存的机会。道光 27 年(1847 年)雷再浩起义，道光 29 年(1849 年)李沅发起义，各山堂便纷纷响应。整个广西的局势十分动荡，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形成一触即发的形势。道光 30 年(1850 年)，都察院奏，广西“逆匪横行，延及七府一州”。

广西山高水险，地旷人稀，远离清朝的统治中心，“僻处荒裔，王师调拨难以时至，本省兵马各有守地，顾此失彼，终不相及”，“额兵 22000 余人，士兵 13000 余人”，兵力薄弱。派到这里的地方官，亦因此地财政困难，油水不多，总想早点调离，遇事则敷衍塞责，“民贫地瘠，官斯土者，率军于边荒僻远，困苦异常，因而相率苟安，不思振作”。巡抚梁章钜、周之琦、郑祖琛都对于广西的事务有意掩饰。他们抱着“苟及吾身幸无事，他日自有执其错者”的态度，州县便逢迎其意，大家一味敷衍，不敢以变故上报。到处都在骚乱，然而，他们却上下欺饰，视若无睹。

因此种种，广西成为清王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在力量对比上就大大有利于农民革命形势的发展。

道光 30 年(1850 年)6 月，洪秀全向经多年组织准备的各地“拜上帝会”的成员，发布总动员令，令各地教徒向桂平县金田村集中，编组军队，准备起义。金田村在紫荆山南麓，距桂平县 50 里。紫荆山是广西的一处交通要道，北与大藤峡毗连，东为平南县，西南为险峻的鹏隘山，山峦起伏，纵横数十里。金田村周围粮产丰富，人口众多，便于集结起事。当洪秀全的动员令下达后，各地教徒纷起响应，自四面八方携带家眷赶来，起义迹象逐渐显露。

在此之前，由于地方官的放任不问，清廷对于广西的问题一无所知。至道光 30 年(1850 年)夏天，虽然，广西巡抚郑祖琛不敢将社会动乱情形据实呈报朝廷，但由于不断有人上奏反映，清政府也日感广西局势不妙。在道光 30 年 5 月 19 日(1850 年 6 月 28 日)，清廷命令郑祖琛“实力查究，尽法惩办”。随着事态发展的严重，咸丰皇帝先后收到兵科给事中袁甲三等人参劾郑祖琛“欺饰弥逢”、“豢贼酿乱”的罪状，又有各省督抚的奏报，广西士绅远道赴京赴阙奏陈全省情况，于是举朝震惊，急谋平乱的方略。

咸丰皇帝免去了广西提督闵正风之职，调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向荣，字欣然，四川大宁人，出身于行伍，有骁将之称，战功卓著，累升为提督。后又将广西巡抚郑祖琛革职，重新起用因病乞归原籍的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署广西巡抚，入桂督师。但林则徐奉旨由原籍启程赴任时，行至广东潮州普宁县病逝。不得不改派在湖南原籍养病的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漕运总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驰赴广西督剿会党起义。

全国政治形势的动荡不安，使得统治阶级内部人心惶惶。清王朝败象横生的迹象，使得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已经预感到情况的严重，并开始筹谋挽回败局的对策。

曾国藩在京为官，目睹种种时病弊政，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反映了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得自儒学的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又使曾国藩对清政府的态度上产生了矛盾。首先，他拥护清政府，因为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这同曾国藩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曾国藩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生长在闭塞的山乡，是科举制度使他跻身于官僚阶层。而他个人则尤为幸运，在短期内迅速升迁，并跻身于六曹，这在当时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因此，曾国藩对清政府充满效忠之情，愿以国家为己任。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表示："一介贫人，身跻六曹，且兼摄两职，若尚不知足，再生奢望，则为鬼神所不许。"他在咸丰元年所写的家信中，更进一步表示："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萌任六品，不为不荣。……我越应当尽忠报国，不得再顾忌自己身家私事了。"同时，曾国藩对清政府又怀有不满。从道光 18 年(1838 年)至咸丰 2 年(1852 年)，曾国藩历经翰林院、詹事府内阁，先后掌管礼、兵、工、刑、吏五部侍郎。多方面的阅历使他"饱更世故"，熟悉和了解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诸多方面。因此，他认为道光末年四处动荡的原因，在于官吏的贪婪和腐败。他在咸丰元年谈及广西局势时说："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结果，导致了官逼民反，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而危及整个统治阶级的秩序。这是曾国藩极为痛恨的。他对清政府过多侵害中小地主的利益也感到十分的忧虑。中小地主是封建统治的基础，他们的破产，必将导致统治集团力量的削弱。因此，他要为中小地主代言，将他们的疾苦向皇帝倾诉。他列举了民间的三大疾苦："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他切中了时弊。

正是由于曾国藩对江河日下的清政府的忧患，决定了他对清政府的态度，希望清政府能够重新振作，改革种种弊端，从而变得强大起来，担负起捍卫统治秩序的责任。

3 正己正人，礼治为先

虽然经风霜，无比凶险，但曾国藩的为官之路还是达到了一种很少有人能企及的辉煌，这，首先得益于他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他昭告天下说："本人德薄能少，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这是实在的。他就是凭着对封建王朝的耿耿忠心而百折不回，最后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

但"忠信"是封建时代大部分臣下的共同思想，除此之外，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中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便是礼治。

礼治，是儒家的传统学说，曾国藩完整地继承了这一学说，并有所发展，使之成为了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

礼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而诞生的。原始社会中，人类对图腾的崇拜，对天地的祭祀，便大有一种"礼"存在其中；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仪礼》、《周官》，是孔子及其后学将他之前的礼仪、礼节和典章制度加以整理而成的。《礼记·礼器》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这都是繁文缛节，但通过这些繁文缛节所体现出来的，却是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于《仪礼》用力甚深”，且任过礼部侍郎的曾国藩，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礼的内容做过详尽的叙述，他认为礼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洒扫沃盥等等生活方面的“常仪”、“定位”或“常度”；一是“辅世长民”、“治国平天下”之术。自然后者是礼的最基本的最本质的内容。

封建社会的“礼”，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的具体内容，常因时而变革。《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本是用以祭祀神灵的。后来，才逐渐用于政事和人事。孔子说：“殷朝沿用夏朝之‘礼’，并有所增补，这可得知。周朝沿用殷‘礼’，并有增补，这也可得知。那些继承周礼的，即使百年，还可得知。”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补充和完善，到了曾国藩生活的时代，礼的内容已大大扩充。“虽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所应讨论之事。”

曾国藩相当推崇清初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原因之一是，他认为这本书除介绍吉、嘉、宾、军、凶五礼外，“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汇粹其中，并综九流，细破无内”，而且“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思精矣。”所以他感慨地说：“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包，本来如是也!”在曾国藩看来，礼是“无所不赅”的，包括为人治世的一切具体内容：“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怎么汇聚?亦曰礼罢了。”这样，他便把礼和他的经世致用之学沟通了起来。这就无怪乎他极力推崇那本各种制度沿革史的《通典》，说：“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有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又说：“欲全览经世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并

且自己“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分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后”，以补秦书之缺，而消弭“其食货稍缺”之憾。

正因为礼无所不赅，所以，声称要效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学”的曾国藩，便强调礼为治政之本。他说：“昔孔子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本质之莫大于仁，外表之莫急于礼。”“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少以究民物之同目源，显以纲维万事，灭世乱于未形。”他把礼的作用看得如此之宏大，以致可以究民物之同源，可以纲维万事，平物我之情，可以息天下之争，弭世乱于未形。礼，简直成了曾国藩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

当然，这样阐述礼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曾国藩的发明。《孟子》说：“见其礼而知其政。”《荀子》说：“礼者，政之车免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左传》中说：“礼以体现政。”“礼，国之干也。”“礼，政之舆也。”“夫礼，所以整民也。”“礼，经国家，定社会，安定民人，利于后嗣者也。”《国语》说：“夫礼，所以正民也。”“夫礼，国之纪也。”《礼记·礼运》说：“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民也。”《中庸》说：“明乎郊社之礼，细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 3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关于礼与国政的这种至大又至纤的关系的学说，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作为湘军的总头目、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也认为，“古之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从深处说，舍礼无所谓道德；从表面说，舍礼无所谓政事。”礼不仅是修身、齐家的道德

规范，更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正宗标准。曾国藩进一步直截了当地说：“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从正面说，学经世之术，就得学礼，或者干脆一点说，经世之术就是礼；从反面说，维护“三纲九法”，就得隆礼。他说：“将欲黜废邪恶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总之，学习礼、尊崇礼、遵循礼，是治政的根本方针。故李鸿章概括曾国藩说：“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郭嵩焘也概括说：曾氏“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

在儒家的开山祖孔子那里，礼的中心课题是正名，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曾国藩亦步亦趋，“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如全面考究名实。”孔子要正的名是什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说：“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是因为正名关系着兴礼乐、中刑罚这样的邦国大政。《中庸》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说明，礼的由来和实质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曾国藩从维护和巩固封建宗法制度的主观愿望出发，深有感慨地说：“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捉。”在《讨粤匪檄》中，他更明确地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挟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有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他声称要扶持的名教，正是这个“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礼；所以他对洪秀全提出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这一朴素的平等思想，深恶痛绝。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军与湘军

之战，实质上是对封建礼教的破坏与反破坏之战。

基于对礼与政治的关系的上述认识，曾国藩提出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主张，认为做到这点，便“自然寡忧寡悔，鬼伏神钦”。“以礼自治”，只是个人的修养；“以礼治人”，便属从政从军一类了。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礼”，早就丢开了礼的繁文缛节的外壳，而仅指礼所体现的宗法等级制度。《礼记·哀公问》说：“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荀子·礼论》说：“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者皆有称者也。”所以曾国藩的“以礼自治”，对于太平军、捻军等被统治者来说，是抹煞造反精神、扼杀革命的思想武器；而统治者手中的“以礼治人”，实是“以礼杀人”的一把软刀子。

曾国藩“以礼治人”的典型例子，是他带勇过程中的所谓“示恩法”。他说：“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他甚至把“示恩法”上升到相当的高度加以阐述。他认为，带勇之法应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曾国藩企图在湘军内部制造一种如父子兄弟般亲热的气氛，然后在这种气氛中，使弁勇重视“仁、礼”这样的封建

名分，从而泯灭军队内部的阶级对立情绪和其他不满情绪，巩固体现于“礼”中的封建宗法秩序。

4 修功建德，立业升官

素怀平治天下之志的曾国藩早期在京为官时，仕途上的发展颇为顺利。他于道光 18 年(1838)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 7 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又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 4 年之中遍兼并兵、工、刑、吏各部侍郎。10 年 7 迁，连跃 10 级，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级四级，廷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37 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 1 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内阁学士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 3 人。”在他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升官速度之快，确让人感到吃惊，分析其原因，首先在于其勤于修身，广交师友，祗砺品行，切磋学问的为官智慧。如前所述，其师从唐鉴、倭仁。师从唐鉴使其得本原之学与平治天下之手在于修身。师从倭仁，则使曾国藩知晓了修身之道，使其思想更趋于成熟，理论更趋于完备，并勤于躬行，持之以恒，体悟颇多，如于自强处胜人便是一例，曾国藩对其弟讲：“弟谓命运做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